

言文象合治符号学思想的探索之路： 评《合治观与汉字符号学——孟华文集》

戚晓杰 钟 鼎

书名：合治观与汉字符号学——孟华文集

作者：孟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 年

ISBN：9787301352241

DOI：10.13760/b.cnki.sam.202501019

《合治观与汉字符号学——孟华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是一部符号学自选集，集作者长期从事符号学研究之大成。多年来，孟华教授“一直努力睁大眼睛看这个世界”（孟华，2024，p.543），关注现实世界与符号世界的关联，思考符号学问题，《文集》就是他独到思考的展现，体现了其言文象合治符号学思想的探索之路。

一、创建崭新文字符号学范式

孟华认为文字不是简单地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是一种意指活动方式。“汉字符号学文字观主要是关于文字意指方式的理论，即它不侧重研究（并非不研究）文字记录、表达了什么，而重点研究文字是如何记录、表达语言的。”（孟华，2024，p.150）依据符号学原理，《文集》以宏观的视野，从中西方文字比较的角度，探究文字表达语言的方式问题。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任何符号都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能指、所指、意指方式。能指是符号的形式要素；所指是符号的内容要素；意指方式是符号的构成要素，即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汉字的能指是由笔画和偏旁构成的平面性的二级结构。所谓二级结构，指汉字多数是合体字，即通过已有的汉

字符号合成的多级符号。拉丁字母的能指则是由笔画构成的线性的一级结构。所谓一级结构,指字母按线性组合方式排列,每个字母都是不可再分析的单位。^①汉字的所指是语言的意义单位,它对应的是语言的精神世界——汉语的语义系统。无论是表意还是表音的汉字,它们的符号功能都是区别意义而不是区别语音。^②拉丁字母的所指是语言的音素单位,它对应的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系统。

意指方式是文字的本质属性,《文集》认为它是划分文字符号类型的根本原则。依据意指方式,文字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汉字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含有造字者的主观动机,这主要表现在汉字能指(形体)的象形性、理据性上,可以解说,因此汉字是由动机性意指方式构成的,是动机性文字。拉丁字母的能指与所指间不含有这种动机性,不可解说,因此是由任意约定的方式构成的,是任意性文字。所谓任意性,是指这种意指方式更强调一种非主观的社会约定性,它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的文化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就是主张权力来自于人们平等的约定,而不是某种历史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是一种‘约定性文化’,东方是一种‘动机性文化’。”(孟华,2024,p.143)

“难得有哪一种文化现象,能像汉字和拉丁字那样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了。”(孟华,2024,p.140)《文集》对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的划分,是一种意义深远的革命性思考,它创建了迥异于传统表意和表音文字学体系的崭新文字符号学范式。表意和表音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文字观,它着眼于记录语言的意义单位或语音单位。动机性和任意性的划分是基于“文字是一种意指方式”的符号学文字观,属于看待语言的不同方式,这样文字就从被动记录语言的身份变为主动表达语言的自主符号系统,并由此奠定了其语象不同对待的底层逻辑:动机性(亦可称为理据性)与视觉理据有关,任意性(亦可称为无理据性)与语言有关。对于文字符号动机性和任意性的划分,潘文国(2002,p.80)给予很高评价,作为“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的典型例子加以说明:“第二篇是孟华(1998)的《动机性文字与任意性文字》,这篇文章通过中西文字比较,阐述了一种符号学的文字观。”王菊泉、郑立信(2004,p.26)也认为:“这些探讨旨在阐述一种与传

① 汉字的字形是可以分节(不是指语言的分节,而是图形的分节)的,类似雷德侯所谓的“模块化”组合(孟华,2014,pp.427-428)。字母是不分节的整体几何图形。

② 汉字内中包含有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但通过不同的字形,可以区别它们的意义。

统文字学截然不同的符号学文字观，因此值得一读，并借以对照反思一下我们所比较熟悉的传统文字学理论。”

二、创立象意、象声“两书”说

基于对古今汉字研究的深刻洞悉，《文集》对以许慎为代表的传统“六书”汉字观，也从符号学视角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与反思。

沈兼士（1986，p. 387）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清醒地意识到表意和表音是汉字系统中两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文字的创造和组织相传有六种原则（就是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前三者可以叫做意符的原则，后者可以叫做音符的原则……”在这里，汉字“两书”思想初现端倪，但对于如何用表意、表音来对“六书”进行概括，尤其是如何对形声字进行归类，尚缺乏清晰认识。之后唐兰（1981，pp. 401 - 403；1979，p. 76）进一步突破“六书”窠臼，将“六书”概括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并指出“象形、象意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时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而后陈梦家（1988，pp. 76 - 78）认为“三书”应该是象形、假借、形声，并指明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变作声符，是为假借字；再向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声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形声是汉字发展的自然结果。裘锡圭（1988，p. 106，p. 107）接受了陈梦家的“新三书论”，认为“表意字使用意符……假借字使用音符……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音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新三书论”不仅触及汉字的功能性二元表达机制，同时也意识到形声字是表意和表音的结合。但“新三书论”仍没有解决形声字的归属问题，只好将它列为独立的一书，这样汉字的二元表达机制就由形声一书的加入而变成三种具体的造字方法。何九盈（2000，p. 181）虽也将汉字分为表意、假借和形声“三书”，但他认为这“三书”是建立在造字表达与借字表达的二元化表达机制之上的。造字表达分为表意类、形声类，借字表达即假借。可见，何九盈的造字表达和借字表达也包含了明晰的“两书”思想。

在前人和时贤关于汉字二元表达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文集》凸显了传统“六书”的造字（动态发生考察）而非构字（静态结构分析）的思想，将“六书”看作汉字生产和运行的动态机制，并将传统的“六书”理论进一步概括改造为“两书”：象意和象声。象意即用含有视觉理据的汉字形体来

表现汉语单位的意义。传统上的单纯表意汉字如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是用象意的方式构造而成的，汉字形体的理据义与汉语的词汇义之间主要是通过象意的手段而关联起来。如“田”字象田地中有阡陌之形，“本”字在“木”的根部加一个指示符号表树根之所在，“杲”字以日在树上表示明亮之义。象声大致相当于六书中的假借，它利用已有的文字来记录新的语言单位，使本字与假借字之间形成一种语音上的联想关系。至于形声字，则是表意的形体和表音的形体结合起来构字的方法，是象意和象声两书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产物。转注字在“六书”中颇具争议，围绕许慎对转注不甚明了的定义和举例，形成了形转说、音义转说、互训说和引申说等形形色色、莫衷一是的解释。但除了形转说为造字方式，音义转说、互训说、引申说都是文字的使用而非造字问题，均不外乎音与意两者，因而，转注可视为摇摆于象意和象声两书之间，代表了汉字符号由理据性向任意约定转化或重新理据化的倾向。如此，就意味着汉字最基础的功能性表达手段只有“象意”（表意）和“象声”（假借）两书。象意代表了动机性或理据性方式，象声则代表了汉字系统中的任意性方式。而动机（理据）性又与视觉理据有关，任意性（无理据）与语言有关，由此，汉字一手抓着语言、一手抓着图像而成为言文象融合的符号体（《文集》亦称之为言文象“合治”或“中性”观），进而形成了迥异于西方语象二元对立的文字符号样态。

在传统的“六书”理论中，假借仅仅只是一种用字之法，然而在“两书”理论中，假借的地位得以提升，被视作整个汉字系统运作的两种最基本的功能性手段之一：“表意”代表动机性方式，“假借”代表任意性方式^①；且象意和象声两书，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种互动、互渗的中性语象关系（可以形声，亦可以转注），因而更为本真。“两书论”的提出，“主要目的是要解释汉字深层结构中的二元表达机制及其普遍的符号学价值，以实现汉字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的通约和平等交流”（孟华，2024，p. 204）。由此，也展现出“两书论”的倡导价值。

三、构筑言文关系、语象关系思维路径

《文集》由多篇论文构筑而成，各部分内容看似分散，各自独立，但

^① 汉字象声的任意性和拉丁字母的任意性不完全相同。汉字象声的任意性是个体的任意性，是假借的谐音原则。拉丁字母的任意性是系统的任意性，是字母的记音原则。拉丁字母的任意性是绝对的，由此形成与图像的二元对立。汉字象声的任意性是相对的，它脱胎于象意，复归于象意。

“中性”“合治”“超符号”这些关键词贯穿其中，因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纵观整部《文集》，它主要围绕言与文、语与象两个主题展开，探讨词语与修辞、汉字与汉语、汉字与图像、汉字与实物符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由此构筑言文关系、语象关系思维路径，为符号学贡献新的理论框架。

言文关系亦即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文集》认为这是一种异质符号关系、一种文字书写语言的意指方式，这里的“文”，包括动机性的“文”和任意性的“文”、象意的“文”和象声的“文”、字本位的“文”和言本位的“文”。根据此种言文关系思想，《文集》进一步提出能指投射和所指投射两种法则。能指投射是指文字影响语言，所指投射是指语言影响文字。汉字的“文”与西方字母的“文”截然不同，前者隐含视觉理据而具有“象符号”的特征，进而与汉语构成一种既融合又对立的“合治”关系。作者尤其关注汉字对汉语的“遮蔽”和“投射”，即汉字对汉语的决定、支配作用，揭示了汉字不仅是汉语的记录工具，同时也是汉语存在和自我生产的基本条件。汉字投射原则是汉字、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过去人们对这一民族特性研究不够。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文字学过分强调“语言投射原则”，而忽略了汉字这样具有强烈自我指涉倾向的符号系统对汉语的干预功能。

言文关系基于一种合治的语言观，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异质性分离原则，即如何区分符号各种关联中的异质要素，如言与文、象的差异性，质料和形式的区别性等；二是关联性统一原则，即各异质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跨界的。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了《文集》“异质性关联”的合治格局。汉语中的言文关系是二级符号关系，文字是看待语言的意指方式，包括字本位和言本位（或能指投射和所指投射、动机性和任意性），汉语研究需在言文两种意指方式既区别又统一的关系中加以开展，对其中的构成要素进行研究。

语象关系（作者早期称为“文象关系”），即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语象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图像符号的日渐兴盛，语象关系问题业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引发广泛讨论。针对此，《文集》作者与王铭玉联手提出“语象合治”这一广义文字符号学说：“因此，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并不是指单一的语言、文字等。”“广义符号家族中，有两类最基本的原型符号：一类是语符，即通常所说的语言符号，包括口语、文字或书写文本以及各种语言替代品如手势、代码等符号；另一类是象符，即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符号，包括了实物符号和各种视觉技术符号。”（王铭玉，孟华，2021，p. 72）两位学者因之探究符号学的第三条路径，即基于中国学

者“语象合治”符号观的语象合治之路。“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一种中性符号观，其主旨是对二元对立及语象分治关系的解除”（王铭玉，孟华，2021，p. 70）。“语象合治”符号观文化积淀深厚，“无论在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中还是在当代西方符号学思想中，均具有理论根底和基础”（王铭玉，孟华，2021，p. 70）。符号学第三条路径的探求乃是当今世界符号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王铭玉、孟华“语象合治”符号学理论构建，学术价值非凡，由此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探索之路，“为世界人文研究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王寅，2024，p. 34），“语象合治”符号观相关理论的横空出世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符号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文集》所论述的语象关系内涵丰富，这里的“象”既包括语言之外的图像即“象符”，又包括语言内中的意象，即表意汉字本身所具有的与视觉有关的意象性。意象与图像有别，前者是通过联想而实现的图像。由此，语象关系呈现于多个层面：语符（语言符号）与象符（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符号），象意与象声两书（象意与视觉理据有关，象声与语言规约有关），形声字的形旁与声旁（形旁保持了象形字的画面感，更接近象符的性质；而声旁则关联着词语的声音，更接近语符的性质），等等。

在语象关系方面，《文集》作者认为语言、文字、象符（图像和实物符号）都是不自足的，需要“在言文象三者关系中研究每一个要素”。因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原创性的符号学概念：“类文字”（融笔画化的字形和线条化的象形为一体的视觉符号），“汉字意象性”（面对汉语的无声性和面对图像的有声性），“超符号”（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语象关系的符号），“证据间性”（在言、文、象三重证据中确定真相），“物语”（词与物关系重新思考的产物），“物语写作”（物的自我言说，区分了名物关系的写作和物名关系的写作），“中性”（二元对立状态的消除），“合治观”（分离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等等，开创了语象关系研究的新境界。

四、彰显符号学研究价值

《文集》语言表达深邃、凝练，有抽象、概括，但一经明了，犹如醍醐灌顶，可以激活读者的专业知识储备，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彰显符号学的魅力。符号学具有巨大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并不局限于符号学，同样可以照耀语言学、美术学乃至文学等各学科，让研究者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发现与创新，开辟新的研究天地。

经由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我们可以发现，“音译外来词属于任意性的语符，是去视觉理据的语本位的书写，是对汉字一个形体、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结构原则的逆反，在这里，每个汉字只作为记录异域相同、相近声音的符号而存在，字形与字义被悬置、被抑制”（戚晓杰，王泓霖，2024）。而音译外来词的意译化（如“science”“democracy”首先被音译为“赛恩斯”“德默克拉西”，后意译为“科学”“民主”），则可以让书写形式再理据化、再词素化，每个汉字的字形与字义都被唤醒，由任意性的语符而变为动机性的字符，而这也正是2023年与2024年之交的冬季网络热词“尔滨”风靡全网的深层动因。事实上，表意汉字记录拼音外来词，就是在这种任意性与动机性中徘徊、寻找平衡，进而达到与汉语的和谐相处的。

由言文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汉字既内在于汉语又外在于汉语，为汉语内部构成之不可或缺的部分。汉语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要素（戚晓杰，2020，p. 3）。把语言视为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的主流观点并非周延。吕必松就明确指出，“语言的要素不能只限于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而是要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要素’”（2007，pp. 4-5）。石定果也指出，“汉字就其本质来说，是立足于表义的，这一点已众所周知，毋庸赘述。因此汉字也应视为汉语的要素之一”（1993，p. 274）。这些非主流观点是经过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学术反思的，能体现汉语的本真面貌。

由能指投射，我们可以认清，之所以“汉语词类问题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陆俭明，2003，p. 28），主要缘于无词形变化的汉字遮蔽使我们忽略了词汇词、语法词的区分，因而就产生了汉语词类划分问题上的一系列混淆。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区分，可以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撑起一个支点，澄清人们在词类划分上的诸多模糊认识，从而化解争端，彻底解决汉语词类划分上存在的问题。“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区分是目前汉语词类划分的问题症结之所在，抓住此问题，可以纲举目张。”（戚晓杰，2015，p. 55）

由语象关系，我们可以发见，现今已为各行各业广泛运用、成为新媒体时代人们沟通交流、信息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格，正是由语符（文本语言符号）与象符（由空白表格体现出的图像符号）组合而成，由此构成图文并茂、语象融合的表述整体。对此加以研究亦是时代之所需，势在必行。然而在现今，因受制于其异质性、交叉性，局限于不同学科的分工，融语言与图像为一体的表格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语象关系观察视角的出现，可以使许多易被忽略的边缘领域逐渐进入学术的视野，由此将

研究引向深入、切实（钟鼎，戚晓杰，2024，pp. 83 - 95）。

由语象关系的层次性，我们可以以语象中性符号学的立场拆解语言学内部（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语言学与其外部（文学、绘画等）之间的壁垒，把语象二元精神推演至整个人文符号领域，认清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比如，‘蛙泳’‘猫步’‘海量’等复合词中，前项是象符，后项是语符；‘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等诗句中，前项‘樱桃’‘杨柳’是象符，后项‘樊素口’‘小蛮腰’是语符；在一些文人画中，题诗是语符（声旁），画面是象符（形旁）；等等。”（田沐禾，2023）

由语象关系，我们还可以探究汉字的艺术世界。汉字属于语言，也属于艺术，准确而言，属于视觉艺术。在视觉艺术的世界里，汉字是一个重要的可供调动的因素。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是最可以成为艺术品的文字，在世界艺术之林熠熠生辉。在中国绘画中，汉字可以进入艺术肌体，与绘画语言共同构成整个画面，赋予画作浓郁的诗情画意，由此体现出中华绘画的特殊品格。汉字艺术设计指对作为能指的汉字进行艺术加工，凸显其字形组构的美感特质，由此使汉字识读不再贫乏、单调，而是充满意味、情趣。

结 语

《文集》是一部原创性著作，它站在符号学的高处看世界，通透、清澈、前沿，这得益于其作者所做的是“对动态语言生活的直接观察而非书本的现成理论”。申小龙（2024，p. 6）曾言：“事实上，我总是从孟华的思想中发现惊奇，感受敏锐，引起思考，汲取智慧”；“新世纪大幕已经拉开，孟华这样的先行者已在筚路蓝缕中勇敢前行，鼓舞和启示着新时代的中国人文学者”。阅读《文集》，亦有同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位学术勇者在汉语符号学领域开疆辟土，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言文象合治符号学思想的探索之路，并带给我们绵绵不绝的思想启迪。而这，也体现出《文集》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陈梦家（1988）. 殷墟卜辞综述. 北京：中华书局.
何九盈（2000）. 汉字文化学.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陆俭明（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必松 (2007). 组合汉语知识纲要.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潘文国 (2002). 汉英对比研究百年. 世界汉语教学, 1, 60-86+115-116.
- 戚晓杰 (2015). 词汇词和语法词: 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症结之所在. 汉语学报, 3, 55-63+96.
- 戚晓杰 (2020). 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东方论坛, 1, 1-18+157.
- 戚晓杰、王泓霖 (2024). “尔滨”缘何受青睐. 语言文字报, 5月15日, 2.
- 裘锡圭 (1988). 文字学概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申小龙 (2024). 汉字逻辑——用眼睛思考. 《孟华文集》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兼士 (1986).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 石定果 (1993). 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 世界汉语教学, 4, 274-278.
- 唐兰 (1979). 中国文字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唐兰 (1981). 古文字学导论. 济南: 齐鲁书社.
- 田沐禾 (2023). 中性符号学视域下的古汉字六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 6月6日, 6.
- 王菊泉、郑立信 (2004).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铭玉、孟华 (2021).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 当代修辞学, 4, 70-85.
- 王寅 (2024). 体认符号学. 中国外语, 5, 34-41.
- 孟华 (2014). 汉字主民的文化符号谱系.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孟华 (2024). 合治观与汉字符号学——孟华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钟鼎、戚晓杰 (2024). 语象关系视域下的表格“语言”研究. 当代修辞学, 5, 83-95.

作者简介:

戚晓杰, 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修辞、汉语符号学。

钟鼎, 硕士, 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术学、文字符号学、语言与图像。

Author:

Qi Xiaojie, Ph. D., adjunct professor of South China Semiot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are Chinese grammar rhetoric and Chinese semiotics.

Email: sdqixiaojie@126.com

Zhong Ding, Master, lecture of College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are fine arts, semiotics of calligraphy, and language and image.

Email: silverzd@qq.com